

忆给周总理拍照

程流锁

在周恩来诞辰96周年之际，我捧出一张亲手拍照、珍存26年的周恩来总理指挥我们唱歌的照片，凝视良久，当时情景还历历在目，不由拿起笨拙之笔，记下这段史实，以表崇敬怀念之情。

一、机场迎接周总理

1967年，我在武汉机械学院读书（后与华中工学院合并），8月中旬开始在校报编辑部工作，除撰稿、改稿外，兼排版和校对。由于工作关系，我刚刚学会照相，总想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摄影创作。

10月上旬的一天，学校接到通知，全体师生去汉口机场欢迎周总理和阿尔巴尼亚贵宾谢胡。我们步行赶到机场，等了两个钟头，还没看见飞机降落。虽然10月武汉的太阳还热辣辣的，但为了一睹周总理的风采，我们仍耐心地翘首以待。

这一天我带着120和135两部照相机，力图把周总理及欢迎人群摄入镜头。中午12点30分左右，飞机从北而来，绕到西边向东滑翔着陆后，在机场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由于相距较远，我们急得什么也看不见，照相机取出来摆弄好多次，找不到合适拍摄点。机场正南有约150米土路，两旁都

很平坦，人很多，我怕汽车急驶而过拍不上，就顺路往南跑，到营房区叉路口停下来，想利用拐弯处拍照。谁知周总理和谢胡乘的敞篷汽车刚到这里，夹道欢迎的人群就拥到路心，挡住了汽车的去路，我被挤到车头附近。这时我看到周总理手拿毛主席语录本，胸戴圆形毛主席像章和长条形“为人民服务”胸章，身着洁净合体的中山装，双手挥舞，示意人们让路。但后面的人想看清周总理，越挤越紧，退也退不得，站也站不稳，想拍照是不可能的。周总理脸上渗出了汗珠，不时地以他慈祥而犀利的目光示意人们让道，并用下颌左右摆动，但都无济于事。持续约20分钟，周总理对工作人员耳语了几句后，汽车改向朝西南开去。我们又追到小礼堂附近，看到十几辆车上的人都下了车，并互相礼让着向小礼堂走来。我拿出相机，调好各部指数，正从反光镜中取景，不防被警察迎面推了一掌，使我几乎坐在地上。我虽遗憾，但内心还是理解警察的工作。后来得知，人疏散一部分后，周总理和阿尔巴尼亚贵宾通过航空路、武圣路、汉水桥和长江大桥，直驱东湖宾馆。

二、武昌再见周总理

“文革”中的1967年，武汉很不平静，7月20日发生了闻名中外的“七·二〇”事件，两派对立情绪很严重。据说周总理一到武昌，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接见军区和省市领导人了解情况，会见群众组织的头头做大联合的思想工作，饭也顾不上吃，觉也顾不得睡，只能在接见空隙或行车途中稍事休息。第二天按安排程序，清晨察看武汉水运工程学院

武斗地址，上午到武汉测绘学院参加军民欢迎会。这一天，秋高气爽，我在强烈的崇拜和热情驱使下，骑自行车从汉口赶到武昌。武汉测绘学院门外，好远都已是夹道欢迎的人海，且已由军人和工作人员实行戒严。这时我鼓足勇气，掏出编辑部制备的“摄影记者证”才得以通行，在众目睽睽之下，一直走到校院迎门的毛主席像前停下来，取出相机，调好光圈、速度，并按假定目标测好距离，等待周总理的到来。谁知长队轿车鱼贯而过，并未看到车上的人。我于是提起相机，从人海夹道中擦身超过轿车，另觅机遇。在测绘学院大操场西南角，我见宾主下车，礼让着绕操场四周的林荫道前行。这时我在离周总理两米处边退边取景拍照，十分紧张。135胶卷只照了几张就被卷断了，换用120照相机照了七八张，才舒下心细心观察周总理。他身材魁伟，步履稳健，和蔼可亲。红卫兵挽着他的双臂，边走边谈，就象拉家常。我能这样看到周总理，且多次拍照，已荣幸之极，一直沉浸于幸福之中。但也清楚看到周总理已经稀疏、花白的头发，面部和手背上的老人斑，脖子上松弛的皮肤，略显倦态的眼皮……周总理为国为民日理万机，付出的精力太多了！后来听说他在武汉两天两夜只睡了四个小时，正式吃了四顿饭，加上现在对周总理的了解，更增加了我对他的崇敬之情。

快转到操场西北角时，在康生陪同下走在前边的谢胡、阿里雅，发现周总理走在后面，阿里雅返身请周总理往前边走，周总理礼貌地向前摆摆手，阿里雅又去前边了。在操场东边，周总理赶到谢胡身边，我们这些土记者也被赶离。在他们走上主席台的同时，我沿主席台下南边走入会场，在前排

蹲下来。

我看了台上的排座和场面，就加入了阵阵鼓掌的人海。此时贵宾们双手合着伸起，以致谢意。当我坐下看相机镜头时，发现光圈、速度仍指在大门口调整的位置上，林荫道上拍的照片肯定是曝光不足。而这时只剩下一张胶卷了。

主席台坐东面西，要拍照只能拍侧逆光。为了用好剩下的一张胶卷，大约9至10点时分，我选好角度，调好光圈、速度和估测的距离，向台上一同志要了一把椅子，放在台下等待时机。

欢迎词和致答词我都没有注意听。司仪读台下递的条子：“请周总理讲话！”周总理健步走向麦克风，双手向下摆，示意大家停止鼓掌，稍微弯下腰说：“我的话明天到新华路体育场讲，今天我指挥大家唱歌！”台下报以热烈的掌声。

先唱《东方红》。当唱到“太阳升”时，周总理上身向后侧转，左臂斜向上举直指太阳，右臂微曲放于胸前。此举使我热血沸腾，面对相机茫然不知所措，懊悔失去了拍照的最佳时刻。这时我急忙登上椅子，对着周总理调焦、取景，比较踏实地拍下周总理指挥我们唱歌的照片。

我退到会场前排，在周总理指挥下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时我的目光全力注视着周总理。只见他双腿分开，右腿稍前，双臂指挥，头部随节拍左右摆动。他满面红光，精神抖擞，热情洋溢，面颊上可看得出酒窝，一表青春气派，与进场时比简直判若两人。当唱到“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时，周总理又自然地向左侧转，左

臂上举，右臂微曲胸前，目光直视太阳许久。这个镜头虽然没能摄取，留下一点遗憾，但却永远幸福地印入我的脑海之中。

三、终生怀念周总理

胶卷当天送照相馆，嘱以最快的速度冲出来。底片多数曝光不足，虽经加厚处理，仍不理想。我放大多次选择，这一张效果最好。

我亲手给周总理拍下的这张照片，虽历经各种运动和搬迁，但我一直珍存身边，至今已26年了。26年来，我既经历过顺利和坎坷，也饱尝了欢乐和艰辛，但只要想到周总理，就胜不骄，败不馁，坚持用自己的血汗书写自己的历史，以不懈的追求迎暑送寒，夜以继日，虽才疏学浅，仍终生从教，“白头未敢偷闲，只因吐丝未了。”

（程流锁，男，中共党员，1940年11月生于洛宁县东宋乡丈庄村，华中工学院毕业，曾任三乡高中、宜阳一中物理教师和宜阳一中业务副校长，多次受省、地、县奖励。并曾在物理通报等15种国家级、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在科普出版社等16家出版社参与编写30余本书，分别为作者、编委、副主编、主编。现为中国物理学会会员、洛阳市物理学会理事、全国中学物理研究者协会理事、中学高级教师、洛阳市广播电视大学宜阳分校副校长（主持工作）。1993年入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教育名人大辞典》。）

我给王震司令员做干粮

史光耀口述 赵巨杰整理

1944年冬，河南军区二分区十八团驻扎在桑园一带，政委王成林住在我家，我帮部队做些地方工作。12月29日下午，八路军南下支队挺进华南，路过我村暂驻，王成林迎接了几位首长，把其中一位迎到我家，首长的行李放在王成林的炕上。

这位首长和蔼可亲，住下后不顾天气寒冷和长途行军的疲劳，立即听取王成林关于宜（阳）浞（池）洛（宁）三县日伪顽活动情况、我党我军工作开展情况及群众生活情况的汇报，并作了关于目前形势任务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事后王政委作了传达）。晚上，首长又向我们当地几位同志询问了民情，并说消灭日本鬼子、取得抗战胜利为期不远了，你们都是当地人，做工作有很多有利条件，要充分发动群众，注意解决群众的疾苦，做好有民族气节的开明士绅的统战工作，动员全民族抗战等。我们觉得首长讲的道理深刻，通俗易懂，表示坚决照办。

当时的豫西处于大灾之后，加之日伪顽烧杀抢掠，群众生活极端困难，不少人家缺粮断炊。部队到达后我们就千方百计筹集粮草，群众也争把珍存的少量粮食拿出来支援亲人。尽管如此，也只是筹集些杂粮和红薯面。下午给首长煮了些红萝卜充饥，直到晚上才弄到几斤白面，由我和哥哥两

人给首长做干粮蛋。第二天部队要出发，我用小布袋将干粮蛋装好送给警卫员。但首长知道后体念民艰，命令不准接收。王政委再三说明是工作人员让首长在长途行军作战中吃的，首长才勉强同意收下。

部队开拔后，王政委说那位首长就是南下支队司令员王震同志。几十年过去了，但王震司令员的光辉形象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之中，每当想起这段往事，就感到无限幸福和光荣。

（史光耀，宜阳县高村乡桑园村人，1907年10月生。1944年10月始帮助八路军十八团做地方工作。1945年2月任宜阳县抗日民主政府二区民政助理员。1945年8月，随部队转移至太岳军区，后任七十一团供给员、晋城县金华商店负责人。1947年8月宜阳解放后，任宜北县政府建设科长、县大队副大队长，宜阳县农林科长、保险公司经理。后任三门峡湖滨区生产武装部副部长，大公公社财政科长，宜阳县医药公司经理。1983年离休，县级待遇。）

张学良近照寄宜始末

老 马

1993年12月17日，青海石油管理局宜阳籍离休干部孙万生，收到了由台北发出，经由美国辗转寄来的西安事变发起人汉卿张学良将军亲笔签名题赠的1993年近照一帧。其经过如下：

1992年夏天，旅居美国的巴黎大学博士、前台湾文化大

学外语学院院长、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黎东方教授，陪同美加利福尼亚州州务卿组团来河南进行友好访问，留郑期间，曾枉驾来宜阳看望旅美医学博士孙万俊的父亲孙铁山先生。会见时孙先生之长子孙万生奉侍在侧，应对垂询。当谈起汉公张学良将军时，孙万生出示其所写的七律与排律两首，黎东方大师颇为首肯，责孙万生另书，由他返美时绕道台北，转致汉公张老将军。事后东方大师曾有来函，称该诗已由张将军之华婿陶鹏飞先生妥呈。1993年冬，汉公张老将军乃以近照一帧寄美国东方大师，大师托其高足荆允敬教授转宜阳旅美医学博士孙万俊先生，再由孙万俊专函寄给长兄孙万生。此照即前诗之回报也。

万生同志所写之七言长律加序五六百字，这里不便转载。兹将其七律一首录出，以飨读者。

百年岁月半多囚，	换取红尘强项侯。
天下英雄知几许，	人间豪客更谁尤。
春秋二穆邀同心，	青史一文约共俦。
最是老天公允处，	锡翁耆寿范神州。

诗中二穆指宋民族英雄岳飞谥武穆、清民族英雄林则徐字少穆。一文指宋丞相、正气歌作者文天祥。

宜阳韩城春秋

全建勋 赵妙远

宜阳韩城，是战国时期韩国都城的简称。近几年来，考古工作者曾多次对这座古城遗址进行实地勘探和初步试掘。与此同时，地方史志工作者也撰写出一些有关学术论著。现根据勘察成果和考证资料，仅就宜阳韩城的兴衰历史简述如下：

（一）

韩国，在西周时期原为武王之子的姬姓国。它初封于韩原，即今陕西韩城县以南处。后来由于猃狁（即后世的匈奴）的侵扰而迁到今河北固安县境，至春秋初年被别的封国所灭。待至战国初期，晋国曲沃桓叔之子韩万又被封于韩国故地韩原。其后以地为姓氏，故称为韩氏。韩氏居韩原，历六代约200年后，因偏居晋国的西陲，又常受西邻秦国威胁，所以到韩贞子时便东渡黄河，把国都迁徙至平阳，即今临汾县西部。

韩氏迁到平阳后，晋国的赵氏、知氏、魏氏、韩氏、范氏和中行氏等六卿，都相继成为新兴的地主阶级代表，并逐渐瓜分了晋国而取得各自独立的政权。据《史记·韩世家》载：“贞子卒，子简子代。简子卒，子庄子代。庄子卒，子康子代。康子与赵襄子、魏桓子共约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于诸侯。”《史记·赵世家》也载：“范氏、中行氏败亡之

后，知伯专政，乃立昭公曾孙骄是谓晋懿公。知伯益骄，请地韩、魏，韩、魏与之。请地赵，赵不与，以其围郑之辱。知伯怒，遂率韩、魏攻赵……襄子乃夜使相张孟同和与韩、魏。韩、魏与合谋，以三月丙戌，三国反灭知氏，共分其地。”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后，都屈于今山西境内。为了向中原地区扩大势力，他们都先后把国都向东南迁移。公元前425年，赵献子即位后就把国都从晋阳（今山西省太原以南）迁至中牟（今河南省鹤壁市以西）。到公元前386年，赵敬侯又迁于邯郸，即今河北省邯郸市以西地带。接着，魏国也于公元前361年把国都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到大梁，即河南开封市。至于韩国，据有关史料记载，先后建都四次：韩氏居平阳，历贞子、简子、庄子、康子四代，约90年左右；韩国都宜阳，仅韩武子一代，约16年；韩国都阳翟（今河南禹县以北），历景侯、烈侯、文侯三代，约30年；韩国都新郑（今新郑以西），历哀侯、懿侯、宣王、襄王、厘王、桓王、王安等，约140年，直至公元前230年被秦国所灭。

（二）

宜阳韩城，在韩国的发展史上占据着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韩氏为了争夺霸业，跻身于强国之列，对宜阳都城的建设极为重视，其都城规模相当可观。据《战国策·东周策》称：“宜阳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数年。”说明宜阳韩城的规模宏伟，人口稠密，贮积丰富，经济繁荣。

故韩城位于今宜阳县城西25公里的韩城东侧，北依秦

岭，南向熊耳，东近洛阳，西望崤函，洛水贯通，土地肥沃。且地处东西二京的要冲和秦楚孔道之上，交通便利，形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的军事战略要地。根据近年来对故城遗址的勘察，该城的形制略呈长方形，南北长1510——2150米，东西宽1630——1843米，分宫城和郭城两部分，总面积310万平方米。宫城位于全城的西北角，北部向外突出，坐落在山坡上；南部与郭城相连，地势平坦。郭城位于全城的东南部，城内西北高，东南低，正中有条高0.5——2.5米东西走向的断崖，把郭城分为南北两部分。这两部分较为平坦，除少数地方被现代村庄占据外，其余多是肥沃良田，对故城遗址起着天然的保护作用。

故城的城垣，全系夯土筑成，东、北两面保存较好，至今大都高出地面3——8米。西和西南角被韩城河冲毁，地上地下都无迹可查。东城墙北起城角村东北，南至苗圃东南的窑场坑，全长1510米，宽18——36米，现存高度3——6米。断崖以南因地势向内收缩，南端长约80米被水冲毁无迹。北城墙东起城角村东北，西至王窑村北的韩王台，依秦岭坡势构筑而成，全长1843米，宽18——38米，现存高度1.5——8米。西城墙北起王窑村北的韩王台，沿韩城河东岸向南至东关村南。其北段大都被村庄破坏，南段被韩城河冲毁，地面无迹可寻。全长约2150米，宽20——35米。南城墙东起苗圃东南的窑场坑，沿小东岭向西延伸，经山神庙至东关村南。山神庙以西被韩城河冲毁。全长约1630米。山神庙以东探出的一段长860米，宽20——30米，现存高度1.2米，其东端长约180米被水冲毁。另外，城垣多为小圆夯筑成，夯层厚度大都在8——10厘米。同时还在城垣上发现有板筑

成的柱洞，洞径7——10厘米，板高0.7——0.9米，并有多处修补痕迹。

从全城的布局看，郭城每面似有城门两座。目前仅在东、北两面各找到一座。东面一座偏东，城墙的豁口宽15米，经发掘系一门一途。门洞宽约8米，门道正中被后来渠道破坏。北面的一座偏西，位于接近宫城处，豁口宽25米，尚待发掘。宫城南面有一门与郭城相连。

另外，在东、北两面城墙外，都有明显的城壕遗迹。城墙与城壕之间有15——20米宽的平面。壕宽17——42米，深7.8——10.5米。壕底多有泥沙，当是西边的河水由宫城南墙北侧引进壕中，绕郭城北面，经东墙东侧流入洛水。这是用来加强城防的。在郭城北墙外侧，发现有五个马面遗迹，每个长约36——51米，宽35——50米，现存高度0.5——2.5米，均系小圆夯薄夯层，当是与早期城墙同时筑成的。这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马面遗迹。在宫城北墙和郭城北墙的转弯处及郭城北墙上一定距离的地方，都堆积着大量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由此说明当时这里有敌楼建筑。这些敌楼既是城上作战的指挥所与了望哨，又是城上军队的武器仓库。

(三)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皆列为诸侯强国。但由于韩都设在宜阳，西邻强秦，东近周室，所以很不利于韩国势力的发展。为了及早蚕食周、郑的国土，韩景侯即位后就徙都阳翟。自此，韩城虽失去国都之地位，但由于其地理位置重要，依然是韩国西部的国防重地，也是秦、韩两国争夺的主要战场。《战国策·韩策一》中苏秦曰：“韩北有巩洛、成

皋之固，西有宜阳商阪之塞。”又据《秦策二》载，公元前308年，秦武王“欲通三川，以窥周室”，即派相国甘茂“攻宜阳，五月而不能拔”，“秦死伤者众”。由此看来，当时宜阳韩城城池坚固，易守难攻，是韩国西部的军事要塞。另据《史记·秦本纪》载，秦昭王七年（公元前290年）“王之宜阳”，秦昭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84年）“王与魏惠王会宜阳”。这说明秦拔宜阳后，就把这里作为向东挺进的军事重镇。

随着历史的发展，宜阳韩城仍处于重要地位。据《汉书·地理志》载，弘农郡有宜阳县。班固自注云：“在宜阳，有铁官。”《后汉书·郡国志》亦载，弘农郡有宜阳县。《后汉书·刘盆子传》中说，赤眉军投降时“积兵甲宜阳城西，与熊耳山齐。帝令县厨赐食，众积困喂，十余万人皆得饱饫。”可见两汉时期仍在这里设立县治，并有冶铁管理机构。待至北朝时期，宜阳故城又迭升为宜阳郡的治所。清代地理学家在《水经注·洛水》昌涧水条疏载：“后魏孝昌初，复置宜阳郡，当治宜阳县。”《北史·泉岔传》载：“曾祖景言魏太延五年（公元439年）率乡里归化，仍引王师平商洛，拜建节将军假宜阳郡守……父安志复为建节将军宜阳郡守。”可见北魏初年已在宜阳故城设置为宜阳郡。《北史·韦孝宽传》载：“乃令孝宽以大将军行宜阳郡事”。这说明直到北周时期，宜阳故城仍是宜阳郡的治所。

关于宜阳韩国都城的兴废问题，历代文献典籍迭有记载与说明。据康熙《宜阳县志》卷十五亢刘杰《宜阳县兴学记》称：“宜阳，古属韩国，初置县，其地延袤。民物丰衍，自为郡秦汉无所废置，至唐始易名寿安，武德元年割西

境置熊州，贞观元年州废为福昌县，县为河南府。《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宜阳县，战国时韩邑……汉置县，后魏置宜阳郡，北周平齐，此城遂废。后周明帝又于一合坞治宜阳县，在今西至十里。隋州县俱废，唐改为福昌。”

综上所述，宜阳韩城创建于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至公元前424年韩武子即位的二三十年间，到北周初年因战争的破坏而废弃，其历史长达千余年之久。它不仅在战国的政治舞台上曾放射出灿烂的光辉，而且在古今中原大地上，不论政治、经济或军事、交通诸方面，都占有重要地位。

主要参考资料

- 1、《战国策》有关部分。
- 2、《史记》有关部分。
- 3、清代和新编《宜阳县志》。
- 4、梁晓景的《韩国都城迁徙考辨》。
- 5 蔡运章的《韩都宜阳故城及其相关问题》。
- 6、张修卿的《韩都宜阳故城述略》。
- 7、《洛阳地区名胜古迹简介》。
- 8、《河南名胜古迹辞典》。

（全建勋，1928年生于新安县磁洞乡江沟村，高中文化程度。1949年2月参加教育工作，历任中小学教师、教导主任及宜阳县广播站编辑等。1982年初从事地方志编纂工作，先后担任宜阳县志总编室副主任和总编辑。近十余年来，除总纂《宜阳县概况》和《宜阳县志》稿150万言外，还在省市

以上12家书报刊物上发表史志文章和诗歌40余篇(首),并
获得河南省地方史志两项成果奖和河南省地方史志先进工作
者称号。现为河南省地方史志协会会员、洛阳市历史学会会
员、洛阳古都学会理事和宜阳县诗词学会副会长,有《全建
勋诗文选》问世。

赵妙远,宜阳县韩城乡西关村人,河南大学历史系函授
专科毕业,曾在韩城西关学校和宜阳县教师进修学校任教。
1990年秋调县志总编室从事地方志编辑工作,现为洛阳市历
史学会会员。1991年以来,曾在《河洛史志》、《河南史
志》、《中州古今》、《史志文萃》和《希望之路》等书报
刊上发表多篇史志文章和报告文学。)

程咬金屯兵的瓦岗寨

赵士友

距宜阳县城东北24里的寻村乡邵窑村北，有一南北长约1400米、东西宽约600米的平地，名曰瓦岗寨，相传为程咬金聚义屯兵反隋之处。

瓦岗寨距洛阳45里，东有惠水河，西有20里长的长野岭。据《宜阳县志》载：“长野岭在县城东北，岭尽处是瓦岗寨，相传为隋末程咬金屯兵处。”长野岭和瓦岗寨是古时洛阳通往陕州、陕西的交通要道，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长野岭东部大路北200米处有跑马岭，高出长野岭300米，因程咬金在此操练兵马而得名。长野岭西部山下，水草旺盛，为程咬金牧马之地，故名小马沟，沿用至今。长野岭大路北、小马沟的南半坡上，有程咬金饮马的泉水，名曰饮马泉，至今清水细流。

瓦岗寨西南二里的下街村，原名闲厩驿，是程咬金训练饲养战马和战马休息之场所。据《宜阳县志》载，下街村原名为“闲厩驿”，清代把全县基层划为28里，县东北部地区称闲和里，即以闲厩驿取名。

在惠水河西边的土崖上，有程咬金的藏兵洞，洞的西口在黄窑村东头小窝沟里边的半崖上。从地面上看，洞全长约

两公里，洞里的实际深度就说不清了。传说民国22年冬有个猎人追一只狐狸，早上从东洞口进去，傍晚才从西洞口出来。1958年9月，寻村公社党委副书记周炳彦，牌窑村大队长张进，带10多个青壮年农民，手执棍棒、火把，从东洞口进到洞内一里许。刚进洞是平道，走一段下扎一个陡坡，然后再上升为平道。这样下扎上升，弯弯曲曲，相当复杂。洞的两边尽是各式各样的套洞房，有圆形的、三角形的，深浅不等，数量极多。另外，洞内还有些加工粮食的石磨、石碾等。由于洞内不少处塌陷，未敢再往深处进，里边到底什么样，还有什么遗物，仍然是个迷。

在惠水河东、牌窑村北，是丘岭地带，相传程咬金的部下将士，战死病歿后多埋在这里。这里土质很好，但过去牌窑村人很少打窑洞居住，因为都说岭上无空地，古墓太多。解放后不少人家打土窑洞，确实挖出了很多古墓。1958年，村民在牌青林家大院挖窑饲养牲畜，挖出墓葬大空心砖50多块。1956年春，我在牌窑工作，组织群众在村北岭上打井8眼，井深30米左右，仍没好水源，但挖出一些古墓，墓中有宝剑（已锈）、印章（篆刻），还有两个30厘米大、可映见人影的大铜镜。可惜当时都未注意收藏，落入打井人手里。

瓦岗寨地面平坦，1956年春，我又组织群众在那里打井4眼，40米以下仍是黄白土质，没有水源。在井深处挖出了大量砖石瓦片，足见这里是一大型古建筑遗址。

隋朝末年，炀帝荒淫无道，天灾人祸逼得农民纷纷造反，当时瓦岗军也是影响较大的农民起义军之一。由于隋建都洛阳，所以瓦岗军与隋军争战的主要战场就在洛阳附近，